

#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史學界對日本「滿蒙論」之駁斥 —以《東北史綱》第一卷為中心之探討

葉碧苓

## 摘要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實乃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以攫取中國滿蒙為目標的一貫「大陸政策」之延續。日本學術界為配合此項政策，遂有為數不少的相關研究與論述。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教授矢野仁一自1920年代起，發表一系列「滿蒙論」著作，強調所謂的「滿蒙」地域之「特殊性」主張。中國史學界以傅斯年為首的一批學者在國難當前，民族危亡之際，亦提出「書生何以報國？」的問題。遂有以駁斥矢野仁一「滿蒙非中國本土論」為撰作主旨之《東北史綱》第一卷出現。

1932年，《東北史綱》第一卷在條件極為克難的情形下出版，使得國聯李頓調查團做出「滿洲是中國完整的一部分，滿洲與中國的關係是恆久的，本質的」的決議；並勸告日本應將滿洲歸還中國，以解決滿洲問題，為中國打了一場漂亮的外交戰。然而著作在匆忙間完成，難免有所疏漏。但也因為傅斯年等人的帶動，東北史研究遂在1930年代成為蓬勃發展的史學研究重點。

關鍵詞：九一八事變、傅斯年、東北史綱、矢野仁一、滿蒙論

# The Chinese History Field's Confutation on Japan's Manchuria-Mongolia Policy after the Mukden Incident — An Inquiry Based on The First Volume of *Manchuria in History*

Pi-ling Yeh\*

## Abstract

The occurrence of the Mukden incident was actually the continuation of Japan's consistent mainland policy toward China which aimed to deprive Manchuria and Mongolia from China since the Meiji Restoration. To cooperate with this national policy of Japan, Japanese scholars published numerous related researches, articles and books. Since 1920s, the eastern Asia history professor of the Kyoto Imperial University, Yano Ziniti published a series of articles and books about the Manchuria-Mongolia policy. In his publication, he emphasizes the regional uniqueness of Manchuria and Mongolia. However, in Chinese history field, Fu Ssu-nien was the first scholar who raised the question to the society, "What can the intellectuals do for their own country?" when their country is in big crises and their ethnicity is in danger. Therefore, the First Volume of *Manchuria in History* emerged in order to confute Yano Ziniti's theory that Manchuria and Mongolia were not part of China's territory.

In 1932, The First Volume of *Manchuria in History* was published under extremely difficult conditions. Nevertheless, due to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the Lytton Commiss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reached the conclusion that "Manchuria is part of integral Chinese territory,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nchuria and China are permanent and inherent"; the Commission also advised Japan to return Manchuria to China so that the problems in Manchuria could be solved, and this was also a great achievement in foreign affairs. Because the book was written in very limited time, it contains a few flaws. Nevertheless, due to the leading role the Fu Ssu-nien played,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northeastern China became very flourishing in 1930s.

Key words : Mukden Incident, Fu Ssu-nien, Manchuria in History, Yano Ziniti, Manchuria-Mongolia Policy

\* Ph.D.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History,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史學界對日本「滿蒙論」之駁斥 —以《東北史綱》第一卷為中心之探討\*

葉碧苓\*\*

## 壹、前言

1931年9月18日深夜，遼寧省瀋陽市柳條湖以北的南滿鐵路軌道發生爆炸。駐紮在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對外宣稱是中國軍人幹的，遂以此為藉口，立即向瀋陽城展開全面攻擊，六個小時之後將瀋陽完全占領，這就是「九一八事變」。戰後調查清楚事實後，發現這是日本關東軍裡一部分軍官和少數謀略者共同策劃的產物。<sup>1</sup>「九一八事變」之發生絕非偶然，而是日本自幕末以來「海外雄飛論」，與明治維新以來以攫取中國「滿蒙」為目標的一貫「大陸政策」之延續。<sup>2</sup>因此，中、日兩國在東北發生軍事衝突，乃是無可避免的事。

在19世紀中葉以前的中國人的眼中，僻處海外的日本，只不過是「四夷」之一的島夷，是處於「絕域」之外的「東夷小國」。明治維新之前，日本輸入中國文物，接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視中國為先進文化國。<sup>3</sup>在相當長的時期裡，兩國基本上維持著友好關係，直到中日甲午戰爭爆發

\* 本文承蒙兩位審查人惠賜諸多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06年6月30日，通過刊登日期：2006年9月28日。

\*\*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sup>1</sup> 花谷正口述，陳鵬仁譯：〈我們如何計劃發動九一八事變〉，《日人筆下的九一八事變》（臺北：水牛出版社，1991年），頁57-76。

<sup>2</sup> 參考陳豐祥：《近代日本的大陸政策》（臺北：金禾出版社，1992年），頁12-13。

<sup>3</sup> 石曉軍：《中日兩國相互認識的變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頁19-20。

後，中日關係才產生了劃時代的轉變。

1894年的甲午戰爭對中國近代所造成的震撼，實遠超過鴉片戰爭。「蕞爾小國」日本竟然打敗了以「天朝」自居的中國，這對中國人來說，慘敗於日本比慘敗於西方，所受的恥辱刺激更大、更沈重。日本原欲藉機奪取臺澎及遼東半島，但在俄國聯絡德、法兩國共同威逼之下，暫時放棄「滿洲」的門戶「遼東半島」，遼東半島得而復失，日本舉國視為國恥。俄國進而占有旅順、大連，在東北與日本形成對峙之局。於是，日本整軍經武十年，為奪取旅大，獨占南滿路礦利益，在中國東北與俄國開打。1904年的日俄戰爭，日本再度打敗另一個強大的古老帝國—蘇俄，其結果是韓國成為日本的「保護國」，日本確立其在滿洲的優越地位。自此，更加助長了日本對華侵略的氣勢。

1910年，日本進而併吞韓國。不久，中國爆發辛亥革命，不過日本各界對辛亥革命的態度並不一致。大體而言，當政的西園寺公望（1849-1940）內閣傾向於維護、延續清朝王室。日本民間以「玄洋社」、「黑龍會」為中心的人物，大多聲援、贊助革命黨，但究其本心，實為誘導孫文出讓滿蒙權益。<sup>4</sup>至於日本陸軍則與大陸浪人相契合，由陸軍參謀本部提供資金、武器支援滿洲及內蒙古，醉心於所謂的「滿蒙獨立計畫」，藉以瓜分中國，其目的乃在獨占南滿權益，進而攫取內蒙。<sup>5</sup>雖然日本內部意見分歧，但有共同看法，即認定中國的動亂實為日本千載難逢的機會，必須善加利用。當時日本政府原本有採取獨斷行動，以武力干涉中國革命的企圖，卻因英國反對日本單獨出兵的牽制，出兵動議即告胎死腹中。為此，日本政府才不得不對中國採取默認的態度。<sup>6</sup>日本的干涉政策雖一時無法實現，但無論是政府、軍部或民間方面，對於擴展在華權

<sup>4</sup> 玄洋社社史編纂會：《玄洋社社史》（東京：玄洋社社史編纂會，1917年），頁566。黑龍會：《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卷（東京：黑龍會出版部，1935年），頁463。藤井升三：〈孫中山與「滿蒙」問題〉，《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3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頁148-164。

<sup>5</sup> 俞辛焯：《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東京：六興出版，1989年），頁178-180。

<sup>6</sup> 林明德：《近代中日關係史》（臺北：三民書局，2005年，二版一刷），頁53。

益的行動仍不遺餘力。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西方列強大部分都捲入戰爭漩渦，無暇顧及中國問題，日本遂得乘機以英日同盟為藉口，對德宣戰，不顧中國的中立，派兵登陸山東，進攻青島，強占膠濟地區。

青島之戰結束後，日本不僅不以山東權益為滿足，甚至為了鞏固並擴大其在滿蒙及中國各地的利益，於1915年1月向北京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在交涉過程中，日本極盡威逼利誘之能事，甚至採取高壓秘密手段，以求迅速解決。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可說是甲午戰爭以後，日本帝國主義大陸擴張政策的必然反應。此舉雖未能完全將中國置於其勢力之下，但無論如何，華北已在日本勢力籠罩之中。因此，二十一條要求可說是日本侵華的第一個頂點，是日本帝國主義「大陸政策」的集大成，甚至指其為「九一八事變」的序幕亦不為過。<sup>7</sup>當時的中國人，特別是在北京的青年學生們，都認為二十一條要求是日本很露骨的殖民要求，將使中國有亡國的危機。因此對於北京政府承認日本的要求，感到相當激憤，紛紛高喊打倒軍閥政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當時中國人亦歡喜若狂，以為山東問題可望藉由巴黎和會獲得解決。孰料列強為保持各國既得利益，輕易承認日本取得德國在山東之全部利益。消息傳回中國，舉國譁然，以北京學生發動反抗列強之愛國示威為最激烈，最後演變成全國性的「五四運動」，一時之間民族主義的浪潮席捲全中國。中國代表為順應民情，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加上美國輿論及反對黨對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輕易承認日本在山東的權益，猛烈責難，導致凡爾賽和約不被美國國會批准，使得巴黎和會未獲圓滿結局，為戰後世界局勢投下陰影。

巴黎和會之後，不僅中日兩國關係極為惡劣，美日之間的關係亦因日本積極擴充軍備、壟斷在華利益而呈緊張之勢。1921年11月，美國為緩和太平洋及遠東的緊張情勢，進而解決軍備限制問題，遂發起華盛頓會

<sup>7</sup> 林明德：〈民初日本對華政策之探討（1911-1915）〉，《中國近現代史論集》，第23編民初外交（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59-61、107-109。

議。日本起初態度頗為消極，因見各國態度堅定，唯恐在國際上陷入孤立無援之境，使其在華權益受損，或在軍備問題產生不利的影響，不得不勉強參加。日本雖在山東問題及其他方面稍作讓步，但對在滿蒙的實際權益部分則始終堅持不放。<sup>8</sup>九國代表在太平洋遠東委員會通過了中國問題「四款決議案」，<sup>9</sup>以及美國提出的「中國門戶開放政策」。「九國公約」之簽訂，雖無法解決中國的各項問題，但日本對華侵略政策亦因之略微收斂，中、日兩國維持了將近十年的大致和平局面，這也堪稱是華盛頓會議的功勞吧！

## 貳、矢野仁一「滿蒙非支那本來之領土論」的展開

日本提出「滿洲」占有論甚早，幕末時代之經世論者佐藤信淵（1769-1850）〈混同秘策〉<sup>10</sup>、吉田松陰（1830-1859）〈幽囚錄〉<sup>11</sup>等之言論，即充滿侵略主義色彩。1901年，「玄洋社」主幹內田良平

<sup>8</sup> 林明德：〈華盛頓會議與中日關係〉，《中國近現代史論集》，第23編民初外交（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593-594。

<sup>9</sup> 四款決議案又稱羅脫四原則，亦即：(1)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及中國領土與行政之完整；(2)給予中國完全無礙之機會，以發展並維持一有力而鞏固之政府；(3)施用各國之權勢，以期切實保障各國在中國境內之商務實業機會均等之原則；(4)不得因中國狀況，乘機營謀特權，相對減少友邦人民之權利，並不得獎許有害友邦安全之舉動。參考李紹盛：《華盛頓會議之中國問題》（臺北：水牛出版社，1973年），頁69。

<sup>10</sup> 佐藤認為：「當今世界萬國之中，皇國較易攻取之土地，莫過於中國之滿洲。蓋滿洲之地與我之山陰及北陸、奧羽、松前等隔海相對者凡八百餘里，其勢固易擾，可知也。」佐藤信淵：〈混同秘策〉，《日本思想大系45安藤昌毅：佐藤信淵》（東京：岩波書店，1970年），頁430。

<sup>11</sup> 吉田於獄中作〈幽囚錄〉論保國之道，提及：「諭琉球，朝覲會同，比內諸侯。責朝鮮納質奉貢如古盛時。北割滿洲之地，南收臺灣呂宋諸島，漸示進取之勢。然後愛民養士，慎守邊圉，則可謂善保國矣。」吉田松陰：〈幽囚錄〉，《吉田松陰全集》，第1卷（東京：岩波書店，1931年），頁596。

(1874-1937)有感於俄國乃日本大陸政策的最大阻撓者，遂結合葛生修亮、葛生東介、吉倉汪盛、本間九介等人於東京創立了「黑龍會」，計劃以流經西伯利亞、滿洲之間的黑龍江為中心的大陸經營。<sup>12</sup>1905年日韓簽訂保護條約後，內田認為日韓「合邦」的重要性不僅止於朝鮮問題的解決，更大的意義在於「大東合邦」，亦即組織亞細亞聯邦。具體做法是先進行日韓兩國的合邦，作為全亞洲的示範，再將「一進會」成員移居滿洲，在「滿蒙」建立鞏固的基礎，其後利用中國革命的機會推動「滿蒙」獨立，仿效日韓聯邦，將滿蒙也加入東亞聯邦之一。最終目標在於以朝鮮、滿蒙、西伯利亞為一體，置於日本統治之下。<sup>13</sup>

黑龍會等日本右翼分子之所以會想到利用中國革命的機會推動「滿蒙」獨立，最主要就是因為孫中山於1894年創立興中會時，是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為誓詞。換言之，革命黨人以漢族主體性為號召，傾覆清廷、創建民國的想法正好讓日本的「滿蒙論」有見縫插針的空間。而孫中山接受日本援助，只因推動革命，需要基地，需要財源，也需要借重國際化的現代化經驗，這些都是日本可以提供的。日本欲分裂中國的野心，孫中山並非全無察覺。特別是自日俄戰爭以後，日本無意變更已然擬定的鯨吞中國的政策，並一直對革命黨持打壓態度。這樣的事實，當然會逼使以追求中國國家主權獨立為己任的中國革命運動，日後非以日本為主敵不可。<sup>14</sup>辛亥革命成功，民國成立之後，「五族共和」成為中國新的民族認同範圍。中華民國政府以五色旗作為國旗，代表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然而，設計「五色旗」的努力並沒有在短時間內完全消弭當時中國「漢族中心論」存在的事實，以致於革命一成功，未

<sup>12</sup> 黑龍會：《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卷（東京：黑龍會出版部，1933年），頁678-679。

<sup>13</sup> 黑龍會：《日韓合邦秘史》，上卷（東京：黑龍會出版部，1930年），頁771；《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卷，頁57、96。

<sup>14</sup> 參考黃自進：〈利用與被利用：孫中山的反清運動與日本政府之關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9期（2003年3月），頁143-145。

迨民國正式成立，滿、蒙等族就在俄國、日本的鼓動和援助下，屢次發動「獨立」、「復辟」之類的行動。

1911年10月10日，爆發辛亥革命，同年11月20日，外蒙古就在俄國的援助下宣布獨立，成立外蒙古國。既然外蒙古已淪為蘇俄的附庸國，日本更不願落人之後。1912年1月14日，日本政壇元老山縣有朋（1838-1922），親撰「對清政略概要」分贈政要，為滿洲獨立政策暖身。山縣有朋呼籲日本應立即派兵進駐東北，以便協助滿清皇室遷都。換言之，他主張在中國東北建立傀儡政權。<sup>15</sup>2月，受日本軍部指使的「支那浪人」川島浪速（1875-1949），夥同日本參謀本部派到中國進行間諜活動的高山公通大佐等人，組織日本義勇軍，操縱以前清王朝肅親王善耆為首的復辟勢力宗社黨分子，誘煽東三省總督趙爾巽（1844-1927），在南滿地區進行復辟活動。他們以「恢復軍權」為口號，組成了「大清帝國勤王師」，並印製了大量軍用鈔票。是以肅親王一在旅順公開露面，滿洲即將獨立之流言，旋即廣布中外。這些活動遭到民國政府鎮壓後，日本接著又在內蒙地區策劃武裝叛亂，結果同樣失敗。

1913年9月，以黑龍會、亞細亞會等十二右翼團體組成的「對支聯合會」，主張對北京政府採取強硬外交。此時黑龍會發表舉世聞名的「黑龍會意見書」，其中「對支問題解決意見書」公然倡導強硬的自主外交，主張滿蒙由中國委任日本統治，並力主乘歐戰結束前的機會，急謀中國問題的根本解決，以樹立日本在東亞的霸業基礎，幾乎為後來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的原形。<sup>16</sup>此乃日本「滿蒙非中國本土論」之肇始。

1916年7月，日本又製造了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這次是以參謀本部次長田中義一（1863-1929）和第二部長福田雅太郎為首的組織團隊，進行了周密策劃和具體部署；並任命土井市之進大佐為「滿蒙舉事」

<sup>15</sup> 北岡伸一：《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9年），頁93。

<sup>16</sup> 《中日二十一條交涉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轉引自林明德：《近代中日關係史》，頁71-72。

總指揮。土井等人到達東北後，和川島浪速等人一起出錢出槍，再次策動宗社黨分子和內蒙的馬賊首領巴布扎布進行武裝叛變。這次的叛亂也被中國政府弭平，讓日本的陰謀再次受挫。<sup>17</sup>

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日本學術界，其研究向來是配合日本的國家政策，充滿「學術」與「政治」緊密結合的特色。歷史學界配合「大陸政策」所進行的學術研究也起源甚早。1908年，受滿鐵總裁後藤新平（1857-1929）的委託，以東京帝國大學東洋史教授白鳥庫吉（1865-1942）為中心的「滿鮮歷史地理調查室」，可謂日本史學界研究「滿鮮」、「滿蒙」史的濫觴。白鳥庫吉以所謂的「烏拉·阿爾泰語系」（Ural-Altai languages）為區分，將萬里長城以北的民族稱為「塞外民族」，形成日本將「滿蒙史研究」視為區域史研究的理論基礎。<sup>18</sup>此外，從1920年代開始到1930年代初期，日本學界關於「支那」研究的立場，也強烈傾向所謂的「滿蒙」地域之「特殊性」主張。<sup>19</sup>以此為中心的代表學者，就是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教授矢野仁一（1872-1970）。<sup>20</sup>而1921年末，矢野仁一之所以提出「滿蒙藏非支那本來之領土論」，實肇因於梁

<sup>17</sup> 參考栗原健：《對滿蒙政策史の一面》（東京：原書房，1966年），頁151；易顯石：〈近代日本對中國東北之侵略與掠奪〉，《第三屆近百年中日關係研討會論文集》，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頁183。

<sup>18</sup> 白鳥庫吉關於這個領域的研究成果有「關於極東史上的滿洲歷史地理」、「滿洲的過去與將來」、「塞外民族史」等，均收入《白鳥庫吉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70年）。

<sup>19</sup> 清水美紀：〈1930年代の「東北」地域概念の形成—日中歷史學者の論争を中心として—〉，《日本植民地史研究》，15號（2003年），頁39。

<sup>20</sup> 矢野仁一的個人簡歷如下：1899年東京帝國大學西洋史學科畢業，畢業論文「中俄關係—特別以尼布楚條約為中心」。1905-1911年應清朝學部之聘擔任進士館教習，主授「近世政治史」、「政治地理」，由曹汝霖擔任翻譯，期間曾與三島海雲、桑原鷺藏同赴蒙古田野調查，並巧遇人類學家鳥居龍藏。（當時日本人在中國任教者，尚有服部宇之吉、太田達人任職師範館，巖谷孫藏、杉榮三郎任職仕學館）1912年任京都帝國大學助教授，1916-1919年留學美國，1920年升任教授，並擔任東洋近世史講座。（上古史講座：內藤湖南，中世史講座：桑原鷺藏）1923-1924年赴「南方」視察。1930年赴蘇聯考察。除論文百餘篇之外，其主要著作如下：1925年《近代蒙

啓超（1873-1929）於華盛頓會議期間所發表的一場演說。

1921年11月26日梁啓超發表演說之時，正是華盛頓會議就中國主權及領土問題做出四款決議案不久之後。會議期間中國代表施肇基（1879-1958）曾就中國方面提出之十項原則進行報告，內容主要包括領土保全、尊重獨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既有條約之再檢討、廢除不平等條約等。各國代表於11月19日第二次太平洋遠東全體委員會中亦曾作出答覆，大致同意承認十原則的提案。然因日本在裁減軍備委員會中，對美、英、日、法、義的海軍主力艦保有率10：10：6：3.34：3.34的比例不表贊同，態度強硬。翌日，美英日三國代表秘密談判，美英表示願在中國議案方面讓步，以交換日本接受裁軍提案，獲日方首肯。迨21日，全體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時，美國代表羅脫（Elihu Root）遂以中國提案過於複雜，乃改頭換面，提出決議案四款，引起激烈辯論。法國代表白里安（Aristide Briand）曾問：「何謂中國（支那）？」羅脫認為：「中國本部與中國行使宗主權各地之間，宜加區別，此議案似僅及中國本部。」對此，中國代表顧維鈞（1888-1985）表示：「中華民國之領土已明定於中國憲法之內，無論何種問題，凡是使人感想以為擬圖變更中國疆界者，中國代表團不能討論之。中華民國之領土自當視為一國家單位，行政完整之原則也應以中華民國為一單位。」羅脫因與日本有秘密協定在先，因此答稱：「顧氏以身為中國憲法所束縛，故除中國憲法所載者外，其他中國疆土之界殊覺不能自由審量，……此項議案並非如一種條約或一種對華宣言，寧謂中國以外各國一種公共意見之表示，至關於中國自由訂立之協定、讓與措施及條約，則吾人既尊重中國主權，即屬尊重中國負責有效之

---

古史研究》；1926年《近代支那史》；1928年《關於我國在滿洲的特殊權益》；1933年出版《滿洲國歷史》；1935年與稻葉岩吉（1876-1940）合著《朝鮮滿洲史》（負責清代之滿洲部分之撰寫）；1939年《滿洲史》；1941年《滿洲之今昔》；1941年《近代西藏史研究》（東洋史講座系列）；1944年《大東亞史的構想》。上述資料參考〈六十年の思出で〉，《東方學》，28號（1964年7月），頁17；《矢野仁一博士追悼錄》，附於《東洋史研究》，28卷4期（1970年3月），頁45-56。

行爲。」措辭極為圓滑，輕易地把各國在華已有權利略而不談。<sup>21</sup>

日本代表更在會中故意扭曲施肇基所提之十項原則，並對「中國門戶開放政策」解釋為：「中國極願開發其天然富源，供各國取給。」又謂：「中國為一極富庶之國家，此世人所共認，但天然之富源，如窖而不發，置而不用，其價值蕩然無有，為利用此富源起見，中國實應大開門戶，歡迎外國資本外國貿易及企業，毋須加以抵制。」試圖合法化其對中國滿蒙「特殊權益」之追求。<sup>22</sup>消息傳回中國，梁啟超大表不滿，認為華盛頓會議是各國，尤其是日本，欲遂行「重畫中國疆土說」與「國際共管說」的企圖表現，大不利於我國，因此「不能不向世人辨明一番，兼要令中國人知道覺醒」。遂有11月26日在天津青年會的演說。<sup>23</sup>

梁啟超認為日本鼓吹「中國疆域，應限於長城以內的十八省」，是日本幾年來所倡「滿蒙除外」更進一步的陰謀，其用意不外是要把東三省收作自己的囊中物。梁氏根據歷史證據提出中國形成的基本地理觀係繼承《禹貢》等古代地理書中關於「九州」、「五服」的所有區域，因此東三省與內地十八省一樣都在「四海」之內，都是中國的疆域，謂：

原來中國文化，起源於北部。五千年開國的黃帝，他的京城在涿鹿，就是現在張家口附近的涿鹿縣。因為如此，所以勢力先從北方進展。長江一帶還未開闢的時候，關外地方，早已入中國版圖了。據說堯舜時代的幽州營州，就是現在東三省。……當戰國時（西曆紀元前四百年以後）奉天全省及朝鮮，都是當時那七大國中燕國的領土。燕國是紀元前一三四年受封下來，初封之君，是周文王的兒子，是中華民族的血脈，燕國

<sup>21</sup> 參考李紹盛：《華盛頓會議之中國問題》，頁66-69。

<sup>22</sup> 參考李紹盛：《華盛頓會議之中國問題》，頁75-76。

<sup>23</sup> 此次於天津青年會演說之講稿〈太平洋會議中兩種外論的闢謬〉，發表於1921年12月6日上海《時事新報》上，亦以〈太平洋會議中兩種外論的闢謬—重畫中國疆土說與國際共管說〉為題收錄於《飲冰室文集》之37（臺北：中華書局，1983年，臺三版），頁13-20。

的領土，當然就是中華民族的領土了。……秦漢統一以後，這塊地方就二千多年長為中國的郡縣。中間偶然有些武人割據獨立，或者外族偶然侵入占據，總是不久就依然收回。<sup>24</sup>

1921年12月6日，上海《時事新報》刊載梁啓超演說全文後，矢野仁一隨即於同月25、26日《大阪朝日新聞》以「支那無國境論」回應，並於1922年1月的《外交時報》發表著名的「滿蒙藏非支那本來之領土論」一文，再次重申日本對華盛頓會議中「何為支那？」的理解，強調中國原來之領土指的是滿洲、蒙古、西藏、青海等除外之十八省。並認為梁啓超提出之滿洲、蒙古為中國領土的看法乃是無視歷史的言論，他提出滿洲、蒙古、西藏乃是中國的「邊疆地方」，非中國力之所及之「特殊地域」。亦即「支那≠清」、「支那=支那本部」、「支那=漢民族之領域」，「滿蒙藏」之各民族領域係由各民族原來所支配，中華民國自辛亥革命成功以來只是一個十幾年歷史的年輕國家，很難稱得上是近代國家，因此中華民國宣稱繼承包含「滿蒙藏」在內的清之領土的主張是很難成立的。只要中國願意以無盡藏之天然富源，資助日本，兩國締結同盟，則日本人何需主張對滿洲之「特殊利益」。<sup>25</sup>

矢野仁一的「滿蒙非支那本來之領土論」，經1927年上台組閣的田

<sup>24</sup> 《飲冰室文集》之37，頁13-20。

<sup>25</sup> 矢野仁一：〈支那無國境論〉，《大阪朝日新聞》，日本，1921年12月25、26日；後補充為〈滿蒙藏は支那本來の領土に非る論〉，《外交時報》，35卷1號（1922年1月）；〈支那は國に非る論〉，《外交時報》，35卷4號（1922年4月）。其後矢野仁一又發表了幾篇文章，反覆強調其主張，這些文章後來都收錄在《近代支那論》（東京：弘文堂，1923年）。九一八事變前後又陸續發表了數篇文章，反覆為日本滿蒙論辯說。分列如下：〈日本の滿洲に於ける歴史上の地位を論ず〉，《東亞》，3卷1號（1930年1月）；〈滿蒙に於ける日本の正當なる地位を論じて世界の公論に訴う〉，《外交時報》，60卷1號（1931年10月）；〈近代滿洲歴史序説〉，《東亞經濟研究》，16卷1號（1932年1月）；〈歴史上滿洲に對する支那主權説の無根據を論ず〉，《外交時報》，64卷2號（1932年10月）；〈歴史上より見たる滿洲〉，《懷德》，10號（1932年10月）；〈滿洲に於ける支那人口と支那の文化に就いて〉，《東亞經濟研究》，17卷1號（1933年1月）。

中義一在「東方會議」時提出討論，作為進行全面侵華政策之思想基礎。會議結束，田中特別發表的「對支政策綱領」八項，其中六至八項有關滿蒙之主張，即引用矢野仁一之理論。綱領中強調基於滿蒙在日本「國防及國民生存上具有利害關係」，將滿蒙視為特殊地區，實行「滿蒙」與「中國本土」相分離的方針，對中國內部事務實行武力干涉的政策。<sup>26</sup>田中此種繼承日俄戰後軍方武斷派激進主義之傳統，在東方會議後喧騰一時的所謂「田中奏摺」中，亦表露無遺。該奏摺內文有關滿蒙之戰略地位，及其與日本總體戰準備之關係，均有極詳盡的闡述規劃，略謂：

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亦是我日本帝國生存上必要之事也。

……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須以積極的對滿蒙強取權利為主義，以權利而培養貿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業之發達，亦可避歐勢東漸，策之優，計之善，莫過於此。……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於亞細亞大陸者，握執滿蒙權利，乃其第一大關鍵也。

……況最後之勝利，賴糧食也；工業之隆盛者，賴原料也；國力之充實者，賴廣大之國土也。我對滿蒙之權利，如以積極政策而擴張之，可以解決此種種大國之要素者毋論矣。……<sup>27</sup>

而以石原莞爾（1886-1949）為中心的關東軍，亦以此論為其基礎，提出其「滿蒙論」認為：

滿蒙非漢民族之領土，其關係與我國密切。即使閉口不談民族自決，滿蒙是滿洲人及蒙古人之領土，而滿洲人、蒙古人比起漢民族，無寧被認為與大和民族更接近。現在的住民雖以漢人種

<sup>26</sup> 參考古川萬太郎：《近代日本の大陸政策》（東京：東京書籍株式會社，1991年8月），頁456-459；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日本侵華七十年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頁264-265。

<sup>27</sup> 田中奏摺之真偽曾有辯論，此處不加評斷，然其內容與之後日本侵華之次第計劃若合符節。參考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革命文獻》，第32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68年），頁444-452。

最多，但其經濟上的關係比起支那本部，更與遙遠的我國更加密切。<sup>28</sup>

1931年5月，石原又撰擬「滿蒙問題私見」一文，提到滿蒙的經濟價值說：

滿蒙的農產品足以解決我國的糧食問題。……鞍山之鐵、撫順之煤等，足以確立目前我國重工業的基礎。……滿蒙的各種企業，可以救濟我國目前的失業者，以便打開不景氣的局面。……滿蒙的資源足以支持我國作為東方的代表，向世界擴張。<sup>29</sup>

同年9月18日，關東軍在柳條湖行使武力，破壞鐵路設備，嫁禍給中國的東北軍，爆發了九一八事變。當時，石原計劃以在瀋陽的少數兵力發動第一波攻擊，採「夜間襲擊」、「先發制人」、「速戰速決」的戰法，企圖在最短時間內將東北直接併入日本領域。但因此舉無法獲得參謀本部及內閣的贊同，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1885-1948）、片倉衷等關東軍參謀部遂評估當下的情勢，認為要一舉占領滿蒙既然已是不可能的，但為切離滿蒙與中國本土，遂從「滿蒙領有論」出發，發展出所謂「滿洲國」（1932年3月1日宣布成立）之「獨立國」建國構想，扶植溥儀為「傀儡皇帝」。<sup>30</sup>而滿清末代皇帝溥儀為了其「復辟」的美夢，也甘願為關東軍利用。因此當李頓調查團到東北詢問他是怎麼到東北的？「滿洲國」是怎麼建立起來的？「滿洲國」實行機會均等麼？溥儀回答：「我是由於滿洲民衆的推戴才到滿洲的，我的國家完全是自願自主的。……我們滿洲國，是滿洲國人和日本人協力而建設的國家，因之新國家的公文，均以滿洲國語和日本語發展。僉能完全使用滿日兩國語言，並能以滿洲國所給與之待遇為滿足，則我們當大大的歡迎。這就是我所說的機會均等。……」<sup>31</sup>

<sup>28</sup> 石原莞爾1927年12月30日起草之〈日本の國防〉，收錄於玉井禮一郎編：《石原莞爾選集5教育革新論/國防政治論》（東京：たまいらば，1986年），頁143。

<sup>29</sup> 角田順編：《石原莞爾資料—國防策論》（東京：原書房，1984年版），頁77。

<sup>30</sup> 白井勝美：《滿洲事變—戰爭と外交と—》（東京：中公新書，1988年），頁76。

<sup>31</sup> 溥儀：《溥儀自傳》，下冊（臺北：金版出版社，1985年），頁445-446、520-522。

當時，日本政友會總裁犬養毅（1855-1932）於九一八事變後，公開支持關東軍行動，且對10月24日國聯理事會做出日軍必須在11月16日以前撤回原駐防區的決議，全面否定。並對若槻禮次郎（1866-1949）內閣應變能力，有所批評。12月11日，若槻內閣因不能統合各方意見，宣布總辭。翌日，犬養在元老西園寺公望的推薦下被任命組閣。犬養是日本國內公認的中國通，素與中國國民政府關係友好，他組閣後的公開發言，立場與政友會總裁時代並無兩樣。但私底下，卻於12月15日選定友人萱野長知為他個人密使，到中國謀和。希望利用其與國民政府長期建立的私人管道，在非官方的基礎上，事先達成協議，而後利用此既成事實來逼使關東軍沒有擴大爭端的藉口。但是此刻的日本，包括軍方、民間輿論，以及行政官僚體系等，卻都陶醉於關東軍帶來的戰利品，反對將這些戰利品送還中國。犬養毅的謀和行動就在這種壓力下屢遭挫折，同時造成其與日本軍部的關係日趨緊張。犬養原本想以天皇力量來整頓日本軍紀，但卻被海軍少壯軍人占了先機，於1932年5月15日公然將其槍殺於總理官邸。自此以後，日本的政壇已無人敢對抗軍方，軍方的軍事急進政策也逐漸成為日本的國策。<sup>32</sup>

### 叁、傅斯年等《東北史綱》對「滿蒙論」的駁斥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對華正式展開侵略的信號，當時的蔣中正（1887-1975）主席或是張學良（1901-2001）少帥對於日本的侵略意圖應該相當了解，只是未能徹底研究注意日本少壯軍人的囂張和日本當時的政情。<sup>33</sup>同時在考量當時中國國內的政局與國防力量，尚不足以對抗日本，遂不得不暫時以「不抵抗政策」因應之，並嘗試尋求外交途徑，要求

<sup>32</sup> 參考黃自進：〈犬養毅與九一八事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期（1996年6月），頁321-329。

<sup>33</sup> 張學良原著，張之宇校註：《雜憶隨感漫錄—張學良自傳體遺著》（臺北：歷史智庫，2002年），頁124。

國際聯盟主持公道。<sup>34</sup>事變當時國聯正在日內瓦開會，9月19日中國代表施肇基即向國聯報告東北的事變，喚起國聯的注意。希望國聯採取必要的手段，保障國際和平，並採取有效的方法以阻止事情的擴大，恢復事變前之原狀。30日國聯決議要求日本將軍隊從速撤至南滿鐵路區域以內，並於10月14日再行開會以考量是時之情勢。當時中國對這樣的結果感到十分高興，蔣主席也相信日本撤兵的可能性，甚至致電張學良準備接收事宜。<sup>35</sup>

當國聯開會時日本代表雖聲稱日軍已開始撤退，實際上其暴行反日益擴大。於是國聯理事會於12月10日決議，派出國聯調查團，協力促進兩國政府謀兩國間各項問題之最後根本解決。<sup>36</sup>調查團以英國的李頓爵士（G. R. Lytton）為團長，故多以「李頓調查團」（Lytton Commission）名之。並由美法義德各派一名團員，日本指派吉田伊三郎、中國指派顧維鈞為襄助員（assessor）。1932年2月代表團自法國出發，首先到達日本；3月14日抵達上海，受到各界熱烈歡迎，4月抵達北平拜會張學良與東北邊署參謀長榮臻，以梅貽琦（1889-1962）、傅斯年（1896-1950）、袁守和（1895-1965）為首的北平各大學教授、文化界代表更主動出面招待調查團。<sup>37</sup>4月至8月間，由顧維鈞總編纂之備忘錄陸續提交與調查團，共有三百多件關於1871年以來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調查，<sup>38</sup>其中亦包括《東北史綱》（*Manchuria in History: A Summary*）的英文節略本。<sup>39</sup>

1931年9月17日北京大學開學，第二天便發生了這場震驚中外的事

<sup>34</sup> 〈國民政府告全國國民書〉（1931.9.23），收錄於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革命文獻》，第35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68年），頁1199。

<sup>35</sup> 總統府機要室輯：《「瀋陽事變」編案紀要初稿》，頁27，轉引自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八到七七》（臺北：國史館，1995年），頁14-15。

<sup>36</sup> Willoughby, W. W., *The Sino-Japanese Controversy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35), pp.177-178. 轉引自林振宙：〈顧維鈞與九一八事變〉，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論文，2001年，頁63。

<sup>37</sup> 〈招待李頓調查團〉，《傅斯年檔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檔號：元437-1、437-2、437-3。

<sup>38</sup> 林振宙：〈顧維鈞與九一八事變〉，頁67。

<sup>39</sup> 《東北史綱》的英文節略本由傅斯年、徐中舒、方壯猷撰寫，李濟節略翻譯成爲45

變。不久，傅斯年等北平著名學者、知識分子在北平圖書館聚會，商討國事。會中，傅斯年慷慨陳詞，憤怒聲討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提出在民族危亡之際，「書生何以報國？」的問題，引起了與會者的共鳴。經過熱烈討論後，大家決定編一部中國通史，以喚起民族之魂，並一致同意由北大歷史系承擔此一艱鉅任務。<sup>40</sup>傅斯年建議北大聘請自學成家的錢穆（1895-1990）主講這門課程，在此基礎上，1938年錢穆寫出了《國史大綱》一書。錢穆信古，對古史懷有宗教式的崇古心理，對國史往往從善的一面去觀察，因此全書流露出一種呼應時代的民族主義史觀。<sup>41</sup>同時，由傅斯年集合多位學者共同撰寫「東北史綱」，駁斥日本矢野仁一的「滿蒙非支那本來之領土論」，以歷史研究證明日本占領東北，成立「滿洲國」之非法。旨在於根據歷史事實說明東北為中國所有，證明東北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東北諸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民族的一員。

此套《東北史綱》原定出版五卷，各卷預定撰寫範圍及負責撰文者如下：

卷一：古代之東北—傅斯年

卷二：隋至元末之東北—方壯猷

卷三：明清之東北—徐中舒

卷四：清代東北之官制及移民—蕭一山

卷五：東北之外交—蔣廷黻

---

頁的簡略本，並註明中文本約十萬餘字，將於1932年5月出版。但事實上，由傅斯年執筆的《東北史綱》卷一是在1932年10月才出版。Li Chi, *Manchuria in History: A Summary* (Peiping: Peking union bookstore, 1932).

<sup>40</sup> 傅樂成：《傅孟真先生年譜》（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再版），頁32-33。

<sup>41</sup> 張禮恒：〈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聊城師範學院歷史系等合編：《傅斯年》（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50。有關錢穆《國史大綱》所蘊含之民族主義情懷，可參考黃俊傑：〈錢賓四史學中的「國史」觀：內涵、方法與意義〉，《臺大歷史學報》，26期（2000年12月），頁1-37；陳豐祥：〈從《國史大綱》看錢穆的史學造詣〉，《教學與研究》，第3期（1981年8月），頁186-203。

而送交國聯李頓調查團的英文說帖，則從傅斯年、徐中舒（1898-1991）、方壯猷（1902-1970）所撰寫的內容裡節錄摘要，並由李濟（1896-1979）負責翻譯事宜。

就各卷的執筆者和卷目來看，可謂一時之選，同時也是中國史學界第一次有計畫地研究東北的歷史。傅斯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辦人，他本身雖不是歷史系的科班生，赴歐遊學主要也不是學歷史，但他以「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之科學的史學精神，引導史語所的各项學術調查，對重建中國上古史的研究，用力頗多，負責卷一「古代之東北」的撰寫，也符合其研究專長。他同時也是一位具有強烈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的人，1932年5月他與丁文江（1887-1936）、胡適（1891-1962）、蔣廷黻（1896-1965）等人創辦《獨立評論》週刊，鼓吹抗日。此外，將其獨子取名「仁軌」，亦是希望對日戰爭早日大獲全勝。<sup>42</sup>

方壯猷，專長為民族史和宋遼金元史，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求學期間，受業於梁啟超、王國維（1877-1927）、陳寅恪（1890-1969），1929年赴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留學，從東洋史講座白鳥庫吉研究東方民族史。翌年，因不滿日本軍國主義日益暴露的侵華野心，憤然棄學回國。1934年赴巴黎，從伯希和（D. Pelliot）研究東方民族史，1936年學成歸國。<sup>43</sup>其所負責之《東北史綱》卷二「隋至元末之東北」，因日本侵略華北，史語所配合政策南遷，而延誤出版。<sup>44</sup>不過其稿本曾送金毓黻（1887-1962）校閱，金毓黻在其所著的《東北通史》上編六卷中亦多處引用《東北史綱》卷二稿本的內容。此外，從英文節略本第三部分「The Uprisings of the Native Tribes and the Interim Periods (352-1372 A.D.)」亦

<sup>42</sup> 傅仁軌，1935年9月15日生，「仁軌」的典故是取自唐朝在朝鮮殲滅日本兵的將領劉仁軌的名字，參考《傅孟真先生年譜》，頁37-38。

<sup>43</sup> 岳華：〈方壯猷傳略〉，《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家傳略》，第7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48-51。

<sup>44</sup> 《東北史綱》卷二的頁碼係接續第一卷，自139頁起，至234頁止，1936年7月已排版完成。見〈京華印書館致函傅斯年〉，《傅斯年檔案》，檔號：元343-1。

可見其梗概。

徐中舒，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第一屆的學生，畢業後因陳寅恪的推薦，進史語所任研究員，負責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的整理，從事卷三「明清之東北」的撰寫，恰為趁工作之便。<sup>45</sup>卷三原定撰寫六章，<sup>46</sup>但因各種原因未能正式出版。<sup>47</sup>徐中舒將部分內容重新改寫，以「明初建州女真居地遷徙攷一兼論元代開元路治之所在」之篇名，發表於史語所集刊。<sup>48</sup>此外，從英文節略本第四部分「Back to the Empire—A Reunion」亦可見其部分內容。

蕭一山（1902-1978），1919年入山西預科大學就讀，是年冬，日人稻葉岩吉《清朝全史》經但燾翻譯為中文，遂激發蕭一山研究清史的志願。1921年轉入北大政治系，1923年《清代通史》上卷問世，越二年續刊中卷，轟動學術界。<sup>49</sup>當時蔣中正對於《清代通史》一書，閱讀至再，嘗向蔡元培加以讚許，並召對垂詢，備承關注。1932年特撥專款資助，以教育部派至歐美考察名義，入劍橋大學深造，研究歷史與國際政治。1934年學成歸國，順道世界旅行一周，途經法、比、德、美、日等國，

<sup>45</sup> 吳天墀：〈徐中舒先生對學術、教育的貢獻〉，四川大學歷史系編：《徐中舒先生九十壽辰紀念文集》（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頁331-332。

<sup>46</sup> 《東北史綱》卷三、卷四的頁數也都已大致確定，稿本也都曾於1936年11月19日送金毓黻校閱。第一至四章內容不詳，第五章「女真之建業及其移民政策」44頁、第六章「蒙古之滿洲經略及其統治」16頁，見〈記東北史綱稿送金毓黻校閱〉，《傅斯年檔案》，檔號：元339-11-1。

<sup>47</sup> 徐中舒帶著這批手稿輾轉南北，歷經坎坷磨難，鼠咬蟲蛀，目前所保留者僅原稿十之一二。2003年10月，大陸學者徐亮工應中研院史語所邀請，來臺進行學術訪問，特將殘餘手稿複印，帶交史語所收藏。該所《古今論衡》刊物，便將手稿中較為完整的〈東三省之封禁（東北史綱選）〉排版印行。參見徐中舒：〈東三省之封禁〉，《古今論衡》，第12期（2005年3月），頁123-135。文末尚有徐亮工之〈校後記〉。

<sup>48</sup> 徐中舒：〈明初建州女真居地遷徙攷一兼論元代開元路治之所在〉（1935年9月完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2分冊（1936年），頁163-192。

<sup>49</sup> 吳學明：〈蕭一山的「民族革命」史觀〉，《明志工專學報》，27期（1995年），頁256。

考察各國社會制度、民俗文化。<sup>50</sup>經日本時，曾至京都東方文化學院拜訪矢野仁一，矢野自陳己見，認為：「滿洲事變後，滿洲已不是中國的領土。」但蕭一山予以反駁，提出：「此說法雖然也有合理之處，但貴國如今以滿洲為附庸對象，這又如何解釋呢？」擔任會談翻譯的吉川幸次郎追憶此事時，認為矢野對於蕭一山的詰問，心中當有所感。<sup>51</sup>1935年蕭一山返抵國門，隨即投入《東北史綱》卷四的寫作，此卷原定卷名為「清代東北之官制及移民」，後來改定為「清代東北之屯墾與移民」，內容分八章117頁，正是蕭一山的專長。<sup>52</sup>雖因戰亂未能正式出版，所幸1941年蕭一山出版《非宇館文存》十卷本時，將全文收入卷四，而得以保存全貌。<sup>53</sup>

蔣廷黻，出身於經世致用學風瀰漫的湖南，1912至1923年留學美國，以〈勞工與帝國：英國勞工自1880年以來對大英帝國主義之反動研究，以其國會代表之言論為中心〉論文，獲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博士。<sup>54</sup>1918年7月至1919年6月期間赴法國勤工儉學，親自經歷巴黎和會，對於拒絕簽署和約後會對中國產生何種影響深感不安。<sup>55</sup>《東北史綱》卷五「東北之外交」，蔣廷黻後來改寫為「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因字數超過原定出版計畫，他與傅斯年商量後決議先在他處出版，並另撰一較簡略之文，作為《東北史綱》卷五稿本。<sup>56</sup>此文只寫到「上、從順治年間到咸豐年

<sup>50</sup> 戴玄之：〈蕭一山〉，《中華民國名人傳》，第1冊（新店：國史館，1990年），頁685-686。

<sup>51</sup> 吉川幸次郎：〈矢野仁一博士の印象〉，《矢野仁一博士追悼錄》，附於《東洋史研究》，28卷4期（1970年3月），頁43。

<sup>52</sup> 見〈記東北史綱稿送金毓黻校閱〉，《傅斯年檔案》，檔號：元339-11-1。

<sup>53</sup> 八章分別為：一、滿洲封禁之意義，二、官莊與旗地，三、京旗之移屯東北，四、奉天之墾務與移民，五、吉林之墾務與移民，六、黑龍江之墾務與移民，七、原屬東內蒙古之墾務與移民，八、東北移民與直魯人。見〈記東北史綱稿送金毓黻校閱〉，《傅斯年檔案》，檔號：元339-11-1。亦見蕭一山：《非宇館文存》，卷4（貴陽：文通書局，1941年）。此處係根據（永和：文海，1973年影印版），頁1-108。

<sup>54</sup> 林文仁：〈介於兩個世界之間—蔣廷黻和他的中國外交史研究〉，《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31期（1999年），頁133-134。

<sup>55</sup> 蔣廷黻口述，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頁72。

<sup>56</sup> 〈蔣廷黻致函傅斯年〉、〈蔣廷黻致函傅斯年、李濟〉，《傅斯年檔案》，檔號：元

間」<sup>57</sup>俄國對東北侵略的部分；咸豐以後的東北，蔣廷黻認為可稱為「半東北」、「殘東北」，因其面積縮小了一半有餘，而且東邊無門戶，北邊無自然防具。之所以造成這個局面乃是因為太平天國的內亂，以及日、俄在朝鮮、東北競逐勢力範圍，加上中國在世界諸民族的競進中落伍了，使得咸豐以後的東北外患問題更為複雜。<sup>58</sup>這部分蔣廷黻本來也想寫出來，但因後來轉入仕途，遂無機會完成。

因為原定出版五卷的《東北史綱》，最後只有卷一和英文節略本正式出版，因此學界討論這套書時，大多只針對傅斯年所撰寫的卷一進行討論。雖然傅斯年並未指明此書是為駁斥矢野仁一「滿蒙論」而寫作，不過在《東北史綱卷首·引語》中已提及撰寫動機，係因日人所謂「大陸政策」、「滿蒙生命線」者，皆向我施其露骨的進攻口號，而國人之酣夢如故也。近以「滿蒙在歷史上非支那領土」一種妄說鼓吹當世，此等「指鹿為馬」之言，本不值一辯。然日人竟以此為其向東北侵略之一理由，則亦不得不辯。亦已明白指出此書的撰寫目的。傅斯年認為東三省是否中國領土，本不以歷史為其根據：

所謂某地是否為某國者，原有兩種條件：其一、依國法及國際公法之意義所規定，或以承襲、或以割讓，通之于本國之法令，見之于國際之約章。依此意義，東北之為中國，在一切法律意義及事實上，與河北或廣東之為中國領土無殊也。……其二、依民族自決之義，必其地之人民多數不與其所屬之國同族，然後始可成為抗爭之論。今吾國人在東北三省者三千萬，日本人不滿二十萬，其中大多數在租借地及南滿鐵道區，其在

---

222-2、222-3；蔣廷黻：〈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清華學報》，8卷1期（1932年12月），頁1-70；此文於1953年4月經中央日報社重新影印發行單行本。

<sup>57</sup> 全文分成六章：一、俄國的遠東發展，二、中俄初次在東北的衝突，三、尼布楚交涉，四、東北一百五十年的安寧，五、俄國假道出師與脅誘割地，六、俄國友誼之代價。另附中俄交界圖。

<sup>58</sup> 蔣廷黻：〈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頁62-63。

中國統治之若干萬方里中僅數千人！如許東北人民自決者，當直將作禍之日本人逐出境外而已。<sup>59</sup>

顯然，傅斯年認定依國際約章的處理，東三省絕無獨立成爲「滿洲國」的條件。而其認同之「民族自決之義」，則是將居住於東北的漢、滿、蒙各族皆視爲「中國人」，嚴詞駁斥日本之「滿蒙論」。但因此書係以歷史研究進行學術對抗，傅斯年遂進一步就歷史以論：

渤海三面皆是中土文化發祥地，遼東一帶，永爲中國之郡縣，白山黑水永爲中國之藩封，永樂奠定東北，直括今俄領東海濱阿穆爾省，滿洲本大明之臣僕，原在職貢之域，亦即屬國之人；就此二三千年之歷史看，東北之爲中國，與江蘇或福建之爲中國又無二致也。<sup>60</sup>

此外，傅斯年又花了一些篇幅解釋本書爲何用「東北」一詞，而不用「滿洲」。他認爲「滿洲」一詞，本非地名，又非政治區域名。此名詞之通行，乃日本及西洋人憑藉侵略中國以造「勢力範圍」之風氣而起；其「南滿」、「北滿」、「東蒙」等名詞，尤爲專圖侵略或瓜分中國而造之名詞，毫無民族、地理、政治、經濟的根據。因此書名用「東北」以簡稱東北三省之區域，並提到卷三將有徐中舒專篇論「滿洲係建州之訛變」的內容。<sup>61</sup>

《東北史綱》第一卷全書分五章：一、「渤海岸及其聯屬內地上文化之黎明」，二、「燕秦漢與東北」，三、「兩漢魏晉之東北屬部」，四、「兩漢魏晉之東北屬部」，五、「漢晉間東北之大事」。第一章從近年來考古人類學在中國北部和東北的發現，證明兩地的人種在遠古皆同爲通古斯種；又以神話爲工具，說明古代之東北部族朝鮮爲殷商之後世，肅

<sup>59</sup> 傅斯年：《東北史綱》（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2年），〈卷首·引語〉，頁1-2。

<sup>60</sup> 傅斯年：《東北史綱》，〈卷首·引語〉，頁2。

<sup>61</sup> 傅斯年：《東北史綱》，〈卷首·論本書用「東北」一名詞不用滿洲一名詞之義〉，頁3-6。

慎為諸夏之與國，與中國歷史朝代之開展有密切之關係；且以殷商、朝鮮、肅慎等地名之核對，推知在中國史初期，渤海兩岸是一體；更以諸史所記東北部族之習俗生活等，得知其與所謂「漢人」有共同的基本成分，與漠北之牧族、西域之胡人，截然不同。因此，從人種、歷史、地理，皆足以說明東北在遠古即是中國之一體。這一部分的研究成果係根據其另外撰寫的「民族與中國古代史」一書改寫而成，傅斯年原來是希望在1933年初出版，不過後來並沒有如願。<sup>62</sup>而第二章以下從燕秦漢到隋前的東北歷史，大多用正史「東夷傳」的材料，郡縣沿革表係余遜代為整理，以引錄原文、史料占其多數篇幅。概括而言，傅斯年全書陳述了三個主要觀點：第一，從神話和民族、考古的發現，古代東北的居民與華北是同一民族，並屬於早期中國文明的一部分，事實上東北亦是中國文明的發源地之一；第二，整個東北有歷史紀錄以來都是在中國政治體系的控制之下；第三，史前和大部分的歷史時代，東北和朝鮮、日本之間是少有維持聯繫的。<sup>63</sup>

此書的英文節錄本經李濟翻譯後，連同三百多件關於1871年以來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調查，以及顧維鈞親撰的總說帖，一併送交國聯李頓調查團。1932年10月2日，「李頓報告書」在日內瓦、北平與東京三地同時公布。整份報告書除緒言外，計有十章，另有附錄。<sup>64</sup>第一章「中國近年變遷之概況」。第二章「滿洲之狀況及其與中國其他部分及俄國之關係」，敘述1931年9月前滿洲的情況，此章有一重要觀點：「目下滿洲之屬中國，已為不可變異之事實。」第三章「1931年9月18日以前關於滿洲

<sup>62</sup> 《東北史綱》，第一卷，頁7-25。

<sup>63</sup> Wang Fang-sen,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49-152.

<sup>64</sup> 關於李頓報告書的內容，英文原文及日文譯文見赤松祐之編輯：《日支紛爭に關する國際聯盟調查委員會の報告》（東京：國際聯盟協會，1932年）；中文譯文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外交部譯：《國際聯合會調查團報告書：一九三二年九月四日在北平簽字》（北平：國民政府外交部，1932年）。

之爭執」，指出日本在滿洲有特殊權利，因而限制了中國主權之行使，累積到一定程度時，中日雙方不得不發生衝突。第四章「9月18日及其後事變之敘述」，調查團認為：「是晚日之軍事行動，不能視為合法自衛之辦法。」第五章「上海」，敘述一二八事變起，至日軍撤退之上海戰事。第六章「滿洲國」，分為三節：第一節「建設『新國家』之歷程」，敘述關東軍占領瀋陽後，至滿洲國建立之間的過程；第二節「現在『滿洲國』政府」，詳查其組織，並及於教育、財政、司法狀況等；第三節「滿洲居民之態度」，調查團認為：「現在之政權，不能認為由真正及自然之獨立運動所產生。……一般中國人對『滿洲國政府』均不贊助。」第七章「日本之經濟利益與華人之經濟絕交」，內容敘述中日貿易關係之重要與抵制日貨的情況；調查團認為，兩國政治關係若不圓滿，使得一方採取武力，一方採取經濟抵制，則兩國無接近之可能。第八章「在滿洲之經濟利益」，內容指出如欲開發滿洲豐富的資源，中日雙方之修好實屬必要。

第九章「解決之原則及條件」，調查團認為此項問題十分複雜，若中日雙方均能承認彼此主要利益相同，並願維持和平與樹立和睦之誼，則可予以解決。報告書提出圓滿解決之條件為：需符合中日雙方之利益；考慮蘇聯利益；遵守現行之多邊條約；承認日本在滿洲之利益；另訂新約，樹立中日間之關係；切實規定解決將來糾紛之辦法；滿洲自治（Autonomy）；維護滿洲內部秩序與免於外來侵略之安全；獎勵中日間之經濟協調；以國際合作促進中國之建設。第十章「考慮及對於行政院之建議」，報告指出若當事國願意接受解決辦法時，可以有修正的空間；調查團一方面顧及國聯原則、關於中國之一切條約，以及世界和平之最高利益，而在另一方面，仍不忽視現存之實況，以及正在演化之東三省行政機關。並建議理事會應請兩國政府，依上述綱領，討論雙方糾紛之解決。其次由中日政府及東北代表、中立國觀察員合組顧問委員會，討論並提出詳密之建議，設立特殊制度以治理東三省，使東北自治。

10月3日，中國外交部長羅文幹（1888-1941）發表對於國聯調查團

報告書之宣言，表示：「試將報告書略加瀏覽，即覺有最顯明呈現之兩點，一為九一八當日及九一八以後之一切日本軍事動作均無正當之理由，不能認為自衛之手段。一為所謂滿洲國者，並非真正及自然之獨立運動所產生，而為日本軍隊及日本文武官吏操縱造作之結果。」<sup>65</sup>而顧維鈞則指出，總的看來，報告書的內容是受到中國報刊的歡迎，至於「東三省雖可賦予寬大之自治，但應由我自動辦理。至中央法律命令與報告書中所稱宣言或條約不相抵觸者，自應一律施行」。<sup>66</sup>亦即從調查團裁決：「滿洲是中國完整的一部分，滿洲與中國的關係是恆久的、且本質的。」並勸告日本應將滿洲歸還中國，以解決滿洲問題。從這樣的結果來看，《東北史綱》的撰寫可謂替中國外交戰打了一場漂亮的勝仗。

反觀日本方面對報告書的反應，當然是無法接受，日方認為滿洲原來並非中國之一部，日軍的行動符合非戰公約中所規定之自衛行動，強調「滿洲國」的獨立運動並無日本唆使之事。同時勸告各國應儘速承認「滿洲國」；滿洲若置於國際管理之下，日滿對此均不能接受。<sup>67</sup>日本代表松岡洋右（1880-1946）更在國聯會議中否認中國方面的所有指控，並極力為關東軍的各項行為辯駁。1932年11月28日，調查團報告送交國聯大會，決議交付表決，結果為全體一致通過，僅有日本棄權。日本對此結果當然無法接受，遂於翌年3月27日照會國聯，正式退出此國際組織。<sup>68</sup>

為了呼應日本政府的觀點，矢野仁一又撰寫了《滿洲國歷史》一書，反駁傅斯年之《東北史綱》第一卷，認為滿洲國之成立為「王道國家論」之理想實踐，並以滿洲國的「國史」立場，為關東軍的侵占東北、扶植「偽滿洲國」的行為辯解。並駁斥傅斯年的主張，認為：「滿蒙」自古

<sup>65</sup> 〈羅外交部長十月三日對於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之宣言〉，《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5卷4號（1932年10月至12月），頁80。

<sup>66</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2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58-61。

<sup>67</sup> 〈日本十一月二十一日所發表對於調查團報告書之意見書之要點〉，《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5卷4號（1932年10月至12月），頁81-83。

<sup>68</sup> 參考林振宙：〈顧維鈞與九一八事變〉，頁89-95。

以來即非「漢民族」居住所在，唐代置都督府，在其後的王朝支配下也都是設置與「支那本部」不同的統治體制，「滿洲」是清朝的滿洲族之故地，在清代為封禁地，其後漢民族從20世紀開始移入，「滿蒙」才成為「支那」的領土。<sup>69</sup>此外，日本歷史學界撰文支持矢野仁一的人也為數頗多。<sup>70</sup>

### 肆、中國史學界對《東北史綱》第一卷的評價及其影響

如果從「李頓報告書」的裁決結果來看，《東北史綱》的撰寫可謂是達到學術報國的目的。而分送各國朝野的二千冊英文節錄本也對外交宣傳起了很大的作用，甚至不久就再版加印。<sup>71</sup>但由於傅斯年的《東北史綱》第一卷寫作時間倉促，材料蒐集不夠齊全，而且他本身對這個領域的知識不夠豐贍，疏漏是在所難免。因此，出版後在中國史學界的評價也褒貶不一。邵循正（1909-1973）、鄭鶴聲（1901-1989）的評論相對持平，而繆鳳林（1898-1959）的長篇大論則顯得語意刻薄。

邵循正認為：「欲明東北之為中國領土，最有力之證據，莫如武力收復，徵載籍張口舌以與，勝何用焉？」但是仍然肯定傅斯年編纂《東北史綱》第一卷是：「陳古者所以規今，解惑者所以起儒，史家職責所存，無所旁貸。」並評論：「傅書重要結論頗多，有甚精審者，有材料未充者，間亦有可商者。」他對傅斯年根據「方言」定北燕朝鮮為一華語區域，西與燕小別，南與齊衛各殊；並以「貊」為古代東北最重要民族的結論頗有同感。且謂：「滿洲一詞為建州一詞之亥豕魯魚」，立說甚當。但

<sup>69</sup> 矢野仁一：〈滿洲は支那の完全な一部であるといふ支那の學者の主張を駁す〉，《滿洲國歷史》（東京：目黒書店，1933年），頁25-103。書名題籤係「滿洲國」國務總理鄭孝胥所書。

<sup>70</sup> 例如「滿蒙特輯號」，《歷史公論》，2卷4期（1933年）；「滿洲史研究」，《歷史學研究》，5卷2期（1935年）。內容除了詳細的歷史考證文章外，也支持矢野仁一的觀點。

<sup>71</sup> 〈王卓然函李濟〉，《傅斯年檔案》，檔號：考31-4-32。

是認為：「商之起源，為上古史之極重大問題，甚有討論價值。」而傅斯年所舉之三項證據：玄鳥生商之故事、亳之地望、箕子王朝鮮，證據皆甚薄弱。總的來說，邵循正認為《東北史綱》第一卷的出版是「倍宜受讀者歡迎者也」。<sup>72</sup>

傅斯年完成《東北史綱》第一卷初稿後，隨即郵寄一份給鄭鶴聲，希望他讀後能寫一篇介紹性的評論文章。但因《圖書評論》雜誌社積壓稿件，致使鄭鶴聲評論之文延至1933年7月才刊載。<sup>73</sup>而在刊載之前，同為「學衡派」的繆鳳林也寫了一篇三萬餘字的評論先單行印出，隨後亦投稿《大公報·文學副刊》。<sup>74</sup>誠如鄭鶴聲在其附言中所說的：「兩評大致雖同，結論頗異：贊虞（繆鳳林之字）於傅著攻擊不遺餘力，至謂『傅君所著，雖寥寥數十頁，其缺漏紕繆，殆突破任何出版史籍之紀錄。』又謂『其自抒所見，言有理致者，全書中惟論真番郡言漢書與應劭說異同數語。』」而鄭之評文一開始即對傅斯年等搜羅東北史料，從事編纂《東北史綱》，藉以駁斥滿蒙非中國領土妄說之舉，極為欣慰。並覺得《東北史綱》第一卷：「其剪裁議論頗有獨到之處，求之於吾國學者著述之東北史書中，尚屬少見，洵足以破日人之妄說，而感世人之興會。」他秉持評論之責，就「正名」、「補遺」、「糾誤」三大部分，提出傅書闕漏舛誤之處，並覺得：「繆評三萬餘字，詳盡自無待言；惟責備之處，不免稍涉激烈耳。」他將繆之評文歸納成十個要點，傅斯年乃據此以「眉批」形式抄錄於手中之藏本，並於文末加註：「此稿大概係彼等所辦之學風中抽出者，學風即學衡之後身也。」<sup>75</sup>

<sup>72</sup> 邵循正：〈評傅斯年東北史綱第一卷：古代之東北〉，《大公報·文學副刊》，278期，1933年5月1日。

<sup>73</sup> 鄭鶴聲：〈傅斯年等編著東北史綱初稿〉，《圖書評論》，1卷11期（1933年7月），頁7-18。

<sup>74</sup> 繆鳳林：〈評傅斯年君東北史綱卷首〉（一）～（八），《大公報·文學副刊》，284-287期（1933年6月12日-7月3日）、291期（7月31日）、295-296期（8月28日-9月4日）、299期（9月25日）。另有單行本36頁，見〈評傅斯年君東北史綱卷首〉，《傅斯年檔案》，檔號：紙本目錄II 604。

<sup>75</sup> 〈評傅斯年君東北史綱卷首〉，《傅斯年檔案》，檔號：紙本目錄II 604。

特別是繆評末段謂：「日人之研究東北史，則遠在二十餘年之前。當時日俄戰役結局（光緒31年），白鳥庫吉已提倡對於東北朝鮮作學術上根本的研究，以為侵略東北及統治朝鮮之助。」其研究成果有白鳥庫吉等《滿洲歷史地理》、津田左右吉（1873-1961）等《朝鮮歷史地理》、池內宏（1878-1952）等《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十餘冊、稻葉岩吉《滿洲發達史》等。而「傅君此書之體裁略與《滿洲歷史地理》同。然白鳥等之書，出版在二十年前，雖亦間有缺誤，而其可供吾人指斥者，實遠不如《東北史綱》之多，此則吾人所認為史學界之不幸者也。吾民族今已與日人立於永久鬭爭之地位，欲鬭爭之成功必求全民族活動之任何方面皆能與日人之相當方面相抗衡（原文加註雙圈），往者已矣，來者可追。竊願後之治東北史者，慎重立言，民族前途、學術榮譽，兩利賴之矣」。傅斯年編寫此書是迫於東北事變，大局震盪，百忙之中，倉促完稿。但面對繆鳳林如此嚴苛的批評，身為中研院歷史語言所創辦人的傅斯年，情何以堪。在其遺留文物中有一張草擬「待寫成之稿」的著述計畫表，其中即有「四、答繆鳳林等評東北史綱」，顯示傅斯年對繆鳳林等人的評論是準備有所回應、批駁的。<sup>76</sup>

「學衡派」即中央大學、南京高等師範系統，他們主張復古主義、折衷主義，自始即反對新文化運動，當時南（高）北（大）兩大學派時有衝突。在繆文發表前夕，胡適（1891-1962）發表了〈評柳詒徵編著中國文化史〉一文，其中有「柳先生是一位不曾學過近代史學訓練的人，所以他對於史料的估價，材料的整理，都不很謹嚴」<sup>77</sup>數語的批評。繆鳳林作為柳詒徵（1879-1956）的學生，起身批評傅斯年，難免有為乃師報復之嫌。而刊載繆文的《大公報·文學副刊》主編吳宓（1894-1978），亦是

<sup>76</sup> 王汎森、杜正勝：《傅斯年文物資料選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5年），頁91。

<sup>77</sup> 胡適：〈評柳詒徵編著中國文化史〉，原載《清華學報》，8卷2期（1933年）。收入《胡適文集》，第10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770。

反新文化運動的要將，顯然有聲援之意。傅斯年生前僅有兩部著作單行出版，一本是《東北史綱》第一卷，一本是《性命古訓辨證》。1952年，其門生第一次對其著作系統整理和出版，編輯凡例稱：「《東北史綱》一書，因非先生一人手筆，茲未收入。」<sup>78</sup>但追根究柢，多少是因為此書受到「學衡派」的貶詆有關。此外，陳槃（1905-1999）在一篇追憶文中也為傅斯年申辯，提到：

這部書用民族學、語言學的眼光和舊籍的史地知識，來證明東北原本是我們中國的郡縣，我們的文化、種族，和這一塊地方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這種史學方法和史識，是最現代的、科學的。但書出版以後，頗受人批評。其實這書的間架、輪廓，非高手不能辦。批評的人從細微末節著眼，當然不無話可說。但是能批評人的，卻不一定就能搭起這樣的間架，描畫出這樣的輪廓。

「前修未密，後出轉精。」鑿荒、開山的工作是創造的、艱難的，後人跟著做補苴罅漏的工作是容易的。<sup>79</sup>

而顧頡剛（1893-1980）作《當代中國史學》時，也提醒人們注意：「日人為了要侵略我國東北，對於我國東北邊疆史地的研究，近年來真是不遺餘力，其研究所得的成績也有足供我們參考的。」<sup>80</sup>但是日本學者以其研究成果作為侵略中國的後盾，中國學者本應有所回擊，因此出版《東北史綱》自應視為一種急迫的政治需要。而《東北史綱》作為中國史學界東北區域史研究的開山之作，對喚起中國學者儘快進入這一領域不啻有「開路先鋒」的作用。1934年2月，顧頡剛等人創設「禹貢學會」，發行《禹貢半月刊》，在發刊詞中提到：

這數十年中，我們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真夠受了，因此，民族意識激發得非常高。……試看我們的東鄰蓄意侵略我們，

<sup>78</sup> 國立臺灣大學編：《傅孟真先生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52年），〈編輯凡例〉，頁1。

<sup>79</sup> 陳槃：〈懷故恩師傅孟真先生有述〉，《新時代》，3卷3期（1963年），頁14。

<sup>80</sup>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頁90。

造了「本部」一名來稱呼我們的十八省，暗示我們邊陲之地不是我們原有的；……禹貢列在書經，人所共讀，但是沒有幽州，東北只盡於碣石，那些讀聖賢書的人就以爲中國的東北境地確是如此的了。不搜集材料作實際的查勘，單讀幾篇極簡單的經書，就注定了他的畢生的地理觀念，這又不是我們的恥辱？……我們要使一般學歷史的人，轉換一部分注意力到地理沿革這方面去，使我們的史學逐漸建築在穩固的基礎之上。<sup>81</sup>

禹貢派致力於中國「疆域」內「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之考證，顯然是要延續梁啓超、傅斯年等人的論點，並希望藉此喚醒民族魂，與矢野仁一「滿蒙藏非支那領土論」敵對，因此研究動態亦備受日本學界矚目。<sup>82</sup>而1936年10月16日發行的「東北研究專號」，除了各時代的東北研究外，也提及日本的滿洲政策，並對日本學者的研究動向、史料目錄作翻譯介紹。<sup>83</sup>顯示中日雙方關於「東北」研究的學術論爭，逐漸高漲，可惜因爲中日爆發「盧溝橋事變」之故，《禹貢半月刊》僅僅維持了三年餘，在出了7卷10期（總計74期）後停刊。

此外，出身東北的金毓黻（1887-1962），1920年代即致力於東北歷史及其歷史文獻的研究，1927年出版了《遼東文獻徵略》。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曾脅迫他參加「滿洲國」政府組織，歷任奉天省圖書館副館長、日滿文化協會理事、奉天通志館總編輯等職務。1936年赴東京的東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回程時經多方擺脫，才逃到南京避難。1937年秋到東北大學東北史地經濟研究室任職，開始撰著《東北通史》。傅斯年等編著《東北史綱》時，曾多次徵詢意見，稿件亦事先送其校閱。他在《東北通史·引言》中提及：

<sup>81</sup> 顧頡剛、譚其驤：〈發刊詞〉，《禹貢》，1卷1期（1934年），頁2-3。

<sup>82</sup> 森鹿三：〈學界展望·禹貢派の人〉，《東洋史研究》，1卷2期（1935年），頁69-72。

<sup>83</sup> 百瀨弘著，劉選民譯：〈日人研究滿洲近世史之動向〉，《禹貢》，6卷3、4合期（1936年10月），頁111-118；青木富太郎等輯，劉選民校補：〈東北史地參考文獻摘目〉，《禹貢》，6卷3、4合期（1936年10月），頁257-297。

今日有一奇異之現象，即研究東北史之重心，不在吾國，而在日本是也，姑無論其用意若何，所述有無牽強附會，而其蒐材之富、立說之繁、著書之多，亦足令人驚歎。……近歲關於東北史之作，雖有多種，然能全部包舉，為有系統之研究者，僅東北史綱一書，惟是書於第一卷發行之後，迄未續出，無可依據。茲所述者，亦為東北史之綱要，而以率爾操觚草創成編之故，僅可名為史稿，以為異日改修之地，沿用史綱之名，則未敢也。<sup>84</sup>

而從已出版的《東北通史》六卷之目錄看來，此書受《東北史綱》的影響頗多。金毓黻亦強調東北指的就是「禹的九州東方的地域」，歷代東北的地理範圍雖有伸縮，但始終都在中國歷代王朝政治力所及的中國「疆域」之內。此外，金氏尚有《渤海國志長編》，並主編了《奉天通志》，其成果對日後東北歷史地理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sup>85</sup>

除了金毓黻和禹貢派的呼應外，九一八事變前後中國學術界尚有許多關於東北問題的研究成果，亦可視為是《東北史綱》的遺緒。例如，華企雲的《滿洲問題》、《滿蒙問題》，周憲文的《東北與日本》，祁乃溪的《滿鐵問題》，周志驊的《東三省概論》，方樂天的《東北問題》，徐正學的《東北現狀》等專書及為數頗多的單篇論文。顯示中國學者在民族存亡之際，亦欲求經世致用，學術報國。<sup>86</sup>

<sup>84</sup> 金毓黻：《東北通史》（臺北：臺聯國風社，1969年影印版），〈引言〉，頁20-21。

<sup>85</sup> 孫進己主編：《東北歷史地理》，第1卷（黑龍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11-12。

<sup>86</sup> 參考趙中孚主編：《近代東北區域研究資料目錄》（臺北：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

## 伍、結 語

日本歷史學者矢野仁一秉持近代日本之「大陸政策」，提出「滿蒙藏非支那本來領土」的理論，認為滿洲、蒙古、西藏乃是中國的「邊疆地方」，都是中國力之所不及的「特殊地域」。亦即「支那≠清」、「支那=支那本部」、「支那=漢民族之領域」。刻意將長城內十八省界定為中國（支那）「本部」與「滿蒙藏」等邊疆民族區域分割開來。從日本利益出發，定義「滿洲」自古以來即為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地域，不在中國政治體系管轄的範圍之內，使日本軍部、關東軍藉此理由對此區域展開軍事侵略，扶植「滿洲國」的成立，都是符合「王道建國論」。相對而言，中國史學界的研究態度與立場當然與之對立。換言之，自古以來「東北」就是包括在中國的「疆域」之內，「東北」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東北史」研究就和「西北史」研究一樣，都是定位為「歷史地理學」的研究範圍。

九一八事變之後，傅斯年在倉促中撰寫的《東北史綱》第一卷，主要是作為說服國聯李頓調查團的說帖。而從調查團的裁決結果來看，國際社會也認同中國方面的見解，說明此書已達到外交宣傳的效果。這種經世致用的救亡圖存思想，可以說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面對國事綢繆，而思報國之道的具體實踐。不過傅斯年滿腔學術救國的熱情，卻在國內史學界出現了「學衡派」的嚴苛批評。撇開學派之爭與民族主義情感的角度，這些評論也並非全是無的放矢。從學術的立場出發，欲致力於東北史研究的學者，的確需要將當時中日學者的論爭，作全盤的認識、檢討，以為今後研究的基礎，亦應對當時中日學者所處的時代背景，以「同理心」的角度看待。本文對此僅作闡述，至於評論則有待另日勉力從之。

## 徵引書目

### (一) 檔案、史料彙編

《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1932年。

《傅斯年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元222-2，〈蔣廷黻致函傅斯年〉。

元222-3，〈蔣廷黻致函傅斯年、李濟〉。

元339-11-1，〈記東北史綱稿送金毓黻校閱〉。

元343-1，〈京華印書館致函傅斯年〉。

元437-1、437-2、437-3，〈招待李頓調查團〉。

考31-4-32，〈王卓然函李濟〉。

紙本目錄Ⅱ604，〈評傅斯年君東北史綱卷首〉。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外交部譯，《國際聯合會調查團報告書：一九三二年九月四日在北平簽字》。北平：國民政府外交部，1932年。

赤松祐之編輯，《日支紛爭に關する國際聯盟調查委員會の報告》。東京：國際聯盟協會，1932年。

### (二) 年鑑、辭典、工具書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革命文獻》，第32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68年。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革命文獻》，第35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1968年。

趙中孚主編，《近代東北區域研究資料目錄》。臺北：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

### (三) 文集、日記、回憶錄

《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家傳略》，第7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中華民國名人傳》，第1冊。臺北：國史館，1990年。

王汎森、杜正勝，《傅斯年文物資料選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5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2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四川大學歷史系編，《徐中舒先生九十壽辰紀念文集》。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

胡適，《胡適文集》，第10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國立臺灣大學編，《傅孟真先生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52年。

梁啓超，《飲冰室文集》之37。臺北：中華書局，1983年，臺三版。

張學良原著，張之宇校註，《雜憶隨感漫錄—張學良自傳體遺著》。臺北：歷史智庫，2002年。

溥儀，《溥儀自傳》，下冊。臺北：金版出版社，1985年。

蔣廷黻口述，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

蕭一山，《非宇館文存》，卷4。永和：文海，1973年影印版。

角田順編，《石原莞爾資料—國防策論》。東京：原書房，1984年版。

#### (四)期刊、報紙

《大公報·文學副刊》，1933年。

《大阪朝日新聞》，1921年。

《時事新報》，1921年。

#### (五)專書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日本侵華七十年史》。北京：中國社

- 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
- 石曉軍，《中日兩國相互認識的變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
- 李紹盛，《華盛頓會議之中國問題》。臺北：水牛出版社，1973年。
- 林明德，《近代中日關係史》。臺北：三民書局，2005年，二版一刷。
- 金毓黻，《東北通史》。臺北：臺聯國風社，1969年，影印版。
- 孫進己主編，《東北歷史地理》，第1卷。黑龍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 聊城師範學院歷史系等合編，《傅斯年》。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
- 陳鵬仁譯，《日人筆下的九一八事變》。臺北：水牛出版社，1991年。
- 陳豐祥，《近代日本的大陸政策》。臺北：金禾出版社，1992年。
- 傅斯年，《東北史綱》，第1卷。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2年。
- 傅樂成，《傅孟真先生年譜》。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再版。
- 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八到七七》。臺北：國史館，1995年。
-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 玉井禮一郎編，《石原莞爾選集5教育革新論／國防政治論》。東京：たまいらぼ，1986年。
- 古川萬太郎，《近代日本の大陸政策》。東京：東京書籍株式會社，1991年8月。
- 北岡伸一，《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9年。
- 矢野仁一，《近代支那論》。東京：弘文堂，1923年。
- 矢野仁一，《滿洲國歷史》。東京：目黑書店，1933年。
- 白鳥庫吉，《白鳥庫吉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70年。
- 玄洋社社史編纂會，《玄洋社社史》。東京：玄洋社社史編纂會，1917

年。

吉田松陰，《吉田松陰全集》，第1卷。東京：岩波書店，1931年。

臼井勝美，《滿洲事變—戰爭と外交と—》。東京：中公新書，1988年。

佐藤信淵，《日本思想大系45安藤昌毅；佐藤信淵》。東京：岩波書店，1970年。

俞辛焯，《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東京：六興出版，1989年。

栗原健，《對滿蒙政策史の一面》。東京：原書房，1966年。

黑龍會，《日韓合邦秘史》，上卷。東京：黑龍會出版部，1930年。

黑龍會，《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卷。東京：黑龍會出版部，1933年。

黑龍會，《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卷。東京：黑龍會出版部，1935年。

Li Chi, *Manchuria in History: A Summary*, Peiping : Peking union bookstore, 1932.

Wang Fang-sen,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Willoughby, W. W., *The Sino-Japanese Controversy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35.

## (六)期刊論文

百瀨弘著，劉選民譯，〈日人研究滿洲近世史之動向〉，《禹貢》，6卷3、4合期（1936年10月）。

吳學明，〈蕭一山的「民族革命」史觀〉，《明志工專學報》，27期（1995年）。

林文仁，〈介於兩個世界之間—蔣廷黻和他的中國外交史研究〉，《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31期（1999年）。

林明德，〈民初日本對華政策之探討（1911-1915）〉，《中國近現代史論集》，第23編民初外交（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林明德，〈華盛頓會議與中日關係〉，《中國近現代史論集》，第23編民

- 初外交（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林振宙，〈顧維鈞與九一八事變〉，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論文，2001年。
- 青木富太郎等輯，劉選民校補，〈東北史地參考文獻摘目〉，《禹貢》，6卷3、4合期（1936年10月）。
- 易顯石，〈近代日本對中國東北之侵略與掠奪〉，《第三屆近百年中日關係研討會論文集》，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
- 徐中舒，〈明初建州女真居地遷徙攷一兼論元代開元路治之所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2分冊（1936年）。
- 徐中舒，〈東三省之封禁（東北史綱選）〉，《古今論衡》，第12期（2005年3月）。
- 陳槃，〈懷故恩師傅孟真先生有述〉，《新時代》，3卷3期（1963年）。
- 陳豐祥，〈從「國史大綱」看錢穆的史學造詣〉，《教學與研究》，第3期（1981年8月）。
- 黃自進，〈犬養毅與九一八事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期（1996年6月）。
- 黃自進，〈利用與被利用：孫中山的反清運動與日本政府之關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9期（2003年3月）。
- 黃俊傑，〈錢賓四史學中的「國史」觀：內涵、方法與意義〉，《臺大歷史學報》，26期（2000年12月）。
- 蔣廷黻，〈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清華學報》，8卷1期（1932年12月）。
- 鄭鶴聲，〈傅斯年等編著東北史綱初稿〉，《圖書評論》，1卷11期（1933年7月）。
- 顧頡剛、譚其驥，〈發刊詞〉，《禹貢》，1卷1期（1934年）。
- 「滿蒙特輯號」，《歷史公論》，2卷4期（1933年）。

- 「滿洲史研究」，《歷史學研究》，5卷2期（1935年）。
- 《矢野仁一博士追悼錄》，附於《東洋史研究》，28卷4期（1970年3月）。
- 矢野仁一，〈滿蒙藏は支那本來の領土に非る論〉，《外交時報》，35卷1號（1922年1月）。
- 矢野仁一，〈支那は國け非る論〉，《外交時報》，35卷4號（1922年4月）。
- 矢野仁一，〈日本の滿洲に於ける歴史上の地位を論ず〉，《東亞》，3卷1號（1930年1月）。
- 矢野仁一，〈滿蒙に於する日本の正當なる地位を論じて世界の公論に訴う〉，《外交時報》，60卷1號（1931年10月）。
- 矢野仁一，〈近代滿洲歴史序説〉，《東亞經濟研究》，16卷1號（1932年1月）。
- 矢野仁一，〈歴史上滿洲に對する支那主權説の無根據を論ず〉，《外交時報》，64卷2號（1932年10月）。
- 矢野仁一，〈歴史上より見にる滿洲〉，《懷德》，10號（1932年10月）。
- 矢野仁一，〈滿洲に於ける支那人口と支那の文化に就いて〉，《東亞經濟研究》，17卷1號（1933年1月）。
- 矢野仁一，〈六十年の思出で〉，《東方學》，28號（1964年7月）。
- 清水美紀，〈1930年代の「東北」地域概念の形成—日中歴史學者の論争を中心として—〉，《日本植民地史研究》，15號（2003年）。
- 森鹿三，〈學界展望・禹貢派の人々〉，《東洋史研究》，1卷2期（1935年）。
- 藤井升三，〈孫中山與「滿蒙」問題〉，《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3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